

# 近代靖边县治迁徙再研究

## ——陕北沿边地方政区治所与城址选择关系的个案讨论

李大海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 治所迁徙与城址选择, 既有联系亦有区别。雍正年间所设之靖边县, 依托于明代从军事防御角度陆路择址修筑的五座城堡。明代嘉靖以后镇靖堡军事价值的提升, 无法动摇靖边营的区域核心地位; 设县时确定治所, 因未找到直接文献, 故原因难以揣度。同治时治所迁移, 与各城堡人口及基础设施等现实因素密切相关; 宁条梁地处边外, 不可能成为备选。“1942 年迁治张家畔”的说法, 掩盖了此间国共两党在陕甘宁边区外围政治角力过程所导致的一县二治局面。陕北沿边地区的治所变动可以影响所驻城堡的历史兴衰趋向, 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边疆内地化的演进格局, 与城堡本身在明代的选址过程并无直接关系。

[关键词] 靖边县 治所迁徙 城址选择 陕甘宁边区

[中图分类号] K9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205 (2012) 02-0082-13

[收稿日期] 2010-08-29

[基金项目] 2011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1&ZD097); 2010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特别支持计划项目”(10ZYT02); 2009 年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 (09SYB01)。

[作者简介] 李大海 (1981—), 男, 山东青岛人,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历史地理和明清社会经济史。

有关清代雍正年间所设靖边县的治所位置, 一般认为初设于靖边营城 (今陕西省靖边县新城乡, 亦称新城堡), 同治八年 (1869 年) 北迁镇靖堡 (今镇靖乡), 抗战时期移于边外小镇张家畔 (今县治)。这一系列变动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 学界虽有讨论和对话<sup>①</sup>, 却仍不失深入探讨之意义。故希望通过下文考察对深化相关问题的认识有所裨益。不周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专家学者继续批评指正。

### 一 军事防御: 明代城堡择址的立足点

明代陕北沿边地区众多营堡城垣的始筑时间, 主要集中在正统和成化时期<sup>②</sup>。这与蒙古诸部重新南下进入河套, 不断扰边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对此, 后人论道: “国初, 敌迤河外, 延

绥以宁。自东胜既失, 北马南渡, 始创边台墩垣

<sup>①</sup>李大海:《明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域城镇体系发展演变与县治迁徙》, 载《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 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第 260—274 页; 张萍:《谁主沉浮: 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的解读——基于明代延绥长城诸边堡的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成一农:《清、民国时期靖边县城选址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 年第 2 辑; 成一农:《中国古代城市选址研究方法的反思》,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 年第 1 辑。

<sup>②</sup>万历《延绥镇志》卷 1《建置沿革》(国家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五年刻本)、康熙《延绥镇志》卷 1《地理志》及雍正《陕西通志》卷 11《城池》; 按明代陕北沿边诸堡中, 有些是在继承北宋和西夏堡寨基础上翻新改建而成, 故本文所谓“始筑时间”更多是从明代开始利用这一角度而言的。

于河之口。建沿边榆林等诸堡，聊用遏遏”<sup>①</sup>。

构成清代靖边县主体的五座城堡，沿边墙自东向西分别是龙州（今龙洲乡）、镇靖、镇罗（今属杨米涧乡）、靖边和宁塞（今属吴起县长城乡）。除镇罗堡修建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外，其余各堡多筑于成化年间。如龙州堡建于成化五年，镇靖堡建于成化八年，宁塞堡建于成化十一年（1475年）。靖边营城垣虽于景泰四年（1453年）新筑，但也经历成化、嘉靖年间的多次拓展<sup>②</sup>。

明代对沿边诸堡城址的选择并非一蹴而就。以靖边诸堡论，镇靖堡“国朝始守塞门，成化五年巡抚王公锐进守笔架城，八年余肃敏公移兵守之”<sup>③</sup>。余子俊移守的地方叫做“白塔洞口”，是为“就快滩河迤南之险”<sup>④</sup>。宁塞堡是“撤三岔堡兵守之”，才得以修筑<sup>⑤</sup>。塞门（砦）和三岔堡都是宋夏对峙时期双方修筑的堡寨<sup>⑥</sup>，而靖边营城则是直接在景泰时改筑北宋保安军兀喇城基础上拓展而成的<sup>⑦</sup>。如果将塞门砦、笔架城和三岔堡看做是镇靖堡、宁塞堡的前身，那么明军驻地在这些城堡之间的不断转移，就可被认为是沿边诸堡城址的选择过程。

是何原因导致明代没有完全沿袭此前已有的城址呢？据程龙研究，宋夏之间的堡寨在地理位置上多是“险”“要”不能兼顾。换言之，扼要者无法据险而立，据险者必失之冲要。因此，无法发挥使敌不能深入为患的作用，实质在于保证宋军的粮食补给，有利于和西夏争夺边境地区的人口和土地资源<sup>⑧</sup>。可见，前代遗留堡寨的先天不足或许正是明代不断调整军队驻所的原因之一。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后人比宋夏之人“明智”，而是表明形势变化可能导致军队驻地选择的改变。

不论守险，还是扼要，都说明沿边城堡的选址主要来自军事攻守的考虑。有学者指出营堡之间保持怎样的适当距离，也是从军事防御角度体现出来的选址因素<sup>⑨</sup>。总之，包括靖边诸堡在内沿边各城池选址的立足点，是和它们接下来所要发挥的军事防御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还可从明政府对影响当时城堡选址的其他因素的态度中得以窥探。以镇靖为例，其“堡北临快滩河，水涨易于淹城，河岸沙土易于崩塌，每遇上

流岸崩壅水，则下流断流，城中无水，人马俱困”<sup>⑩</sup>。方志中留下来设县前该堡“水涨淹城”的记录至少就有四次，最为惨烈的据称是“嘉靖丙寅（四十五年，1566年）大水淹城，继为虏陷，参将鲁聪死之”<sup>⑪</sup>。然而即便如此，这种城堡选址上的“缺陷”也并未使朝廷做出改变军队驻地的决策，说明“白塔洞口”的位置具有极高的军事利用价值。正如余子俊在选择该处等地设立镇靖诸堡后所言：“以守则固，以战则利”<sup>⑫</sup>。与之类似的是靖边营城，其“城中无泉，山中无薪，颇有水火不足之虑”。这些客观上的劣势，在守险的巨大优势面前显然相形见绌，该“营东北皆天堑深沟，堪以据守，南面洞口虽平，近筑新军、家丁二营以为重障，城守颇易”，使“虏不得近薄城下”<sup>⑬</sup>。

明代史料中有关延绥沿边城堡的“迁徙”，或者说军队驻所改变原因的记录，多说是水源太

①[清]查继佐著：《罪惟录·志》第12卷《九边志·延绥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第750页。

②学舟：《明靖边营城周规模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辑。

③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

④[明]余子俊：《地方事》，《余肃敏公集》卷1，载《明经世文编》（第1册）卷61，（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494页；按白塔洞口（亦作“白滩儿”，参光绪《靖边县志稿》卷2《建置志·城池》）应即在“白塔儿站”（参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时期·陕西行省》，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7—18页）；前文“笔架城”亦作“毕家梁”，《明实录》称“毕家梁镇靖堡”（《明宪宗实录》卷120，成化九年九月壬子），以区别后来的“白塔洞口镇靖堡”。

⑤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

⑥李华瑞著：《宋夏关系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2、266页。

⑦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

⑧程龙著：《北宋西北战区粮食补给地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1、35、40页。

⑨赵现海：《明长城的兴起——14至15世纪西北中国军事格局研究》，《中国长城博物馆》2007年第4期。

⑩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镇靖堡》。

⑪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镇靖堡》。

⑫[明]余子俊：《地方事》，《余肃敏公集》卷1，载《明经世文编》（第1册）卷61，第494页。

⑬万历《延绥镇志》卷1《建置沿革·靖边营》、《建置沿革·附城堡·靖边营》。

远或枯竭所致<sup>①</sup>。但如果我们把这些军队迁徙、驻扎城堡的改变看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选择过程，那么此类原因事实上多在其早期出现。换言之，就最终确定而言，包括靖边在内的延绥沿边诸堡选址主要是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考量的结果。

## 二 城堡权衡：清代设县择治的可能

雍正八年（1730年）靖边设县，确定靖边营城为县治所在地。为何如此选择？难道此堡之外，县境其他各堡就都未曾成为“可选项”而在备考之列吗？由于未能找到当时的原始档案，所以解答这些问题，只有依赖于今人对明代至清初靖边诸堡地位和功能差异的分析。

就靖边诸堡而言，无论从卫所设立、军镇建置还是行政官员体系，靖边营城都占据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在区域军事防御的历史背景中也发挥着最为重要的核心职能。即便在整个延绥西路，除定边营外，亦恐再无任何城堡的地位能够望其项背。

靖边营城建成仅三年，朝廷即将陕西按察使司副使杨德派驻于彼，此后该职或为副使、或为佾事，延续至明亡<sup>②</sup>。《实录》中的记载称该员为“管粮佾事”或“副使”<sup>③</sup>，表明其与沿边军马粮草供应密切相关。所谓“靖边管粮佾事”和“靖边管粮道”实为同指，在文臣守边的体制内地位仅次于驻扎镇城的延绥巡抚，是为其所属三道（另为榆林和神木）之一。该员除万历中期因防秋每年须定期赴定边营外，始终都驻扎在靖边营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诏以陕西河西道所辖……保安、安定、安塞三县，属靖边管粮道，各令就近兼理分巡。”说明该道职责范围已扩大至周边郡县<sup>④</sup>。万历时，靖边管粮道转变为兵备道，应是加入“整饬兵备”职责的结果。换言之，此时靖边道既有管粮之责，亦有分巡周边郡县以及整饬边备的多项职能。延绥镇还设有四员管粮同知，其西路一员亦驻靖边营，全称为“延安府分管延绥西路粮厅”<sup>⑤</sup>，简称“西粮同知”，“隆庆初设通判，万历中改同知，驻靖边。”<sup>⑥</sup>该员初属庆阳府佐贰，隆庆五年（1571年）十二月，应陕西巡抚张瀚等人请求，朝廷将

之改注于延安府<sup>⑦</sup>。除上述各级管粮官员外，延绥镇还设有“城堡同知”二员，从万历十三年（1585年）起靖边营即驻有一员。所谓城堡同知是指“专管修筑城堡事务”的府佐贰官员<sup>⑧</sup>。总之，比较靖边营周边各处，恐再未有如此之多司道和府佐贰一级的官员同驻一城者。

在靖边诸堡中除文官外，作为边防重镇尚有大量军队武职官员驻守。就卫所而言，靖边一带并非“榆林卫辖区”。成化年间设立榆林卫时，在靖边营以西的安边营，置守御千户所，当时大致延绥西路皆隶属于庆阳卫辖区。晚至隆庆元年（1567年），在靖边营城置守御千户所，隶属延

① 赵现海：《明长城的兴起——14至15世纪西北中国军事格局研究》，第31—32页。

② 万历《延绥镇志》卷2《建官·靖边道》。

③ 《明宪宗实录》卷287，成化二十三年二月戊寅条；《明孝宗实录》卷75，弘治六年五月庚午条；《明世宗实录》卷475，嘉靖三十八年八月丁巳条。

④ 《明世宗实录》卷457，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乙卯条；按隆庆至万历初年定边道的短暂设立和对靖边道辖区的影响，以及万历《大明会典》中靖边道辖区记载之阙，可详参拙文《明代九边延绥巡抚始设与辖区新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待刊。

⑤ 万历《延绥镇志》卷2《建官·延安府分管延绥西路粮厅》。

⑥ 康熙《延绥镇志》卷3《官师志·文职》，（台北）台湾成文出版社，据康熙十二年抄本影印，1970年。

⑦ 《明穆宗实录》卷64，隆庆五年十二月乙卯条。

⑧ 《明神宗实录》卷164，万历十三年八月庚申条；[明]王遴：《量复城堡官员疏》，康熙《延绥镇志》卷6《艺文志·疏》；按城堡同知初为临时派遣，事完即撤，嘉隆之交，巡抚王遴请复专设延安府带衙城堡同知一员，驻扎镇城。此后，据“改延安府靖边城堡同知……注庆阳府”（《明穆宗实录》卷64，隆庆五年十二月乙卯条）及“延绥巡抚梅有松条上边事：一量复城堡同知二员：一驻榆林镇，一驻靖边营”（《明神宗实录》卷164，万历十三年八月庚申条）可知，王氏建言可能不但得到允准，而且朝廷增加了城堡同知的员额，只是隆庆五年后，这二员同知又被裁撤，故有万历十三年（1585年）梅氏复设之议。

安卫<sup>①</sup>。“设掌印、巡捕千户各一员，吏目一员，管理所事；其各堡领解军马钱粮悉凭印出纳”<sup>②</sup>。显然，作为粮储重地的靖边营在沿边地区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延绥西路诸堡中，只有靖边营和安边营设有卫所建置，同样说明前者地位着实不同一般。

就镇戍体系而言，此前研究对靖边营和其他各堡间的地位差异已有详细论述，基本史实尚且清楚。关键的问题在于由此引申得出的观点却有必要再做检讨。

从驻靖边营城的镇戍武官级别<sup>③</sup>和受到北虏侵扰的频率看，的确无法与北面的镇靖堡相比。特别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延绥巡抚胡志夔在镇靖堡设中路参将后<sup>④</sup>，靖边营城的军事“重要性”似乎不仅远不及延绥西路之定边营、旧安边营，也不如镇靖堡、甚至宁塞营等城堡。笔者以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甚至极端地认为靖边营在延绥西路“军事防御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并不重要”。更不能完全从战争发生地的角度将受到北虏侵扰的次数做为评判城堡边防价值的唯一参数，得出靖边营城“在军事防御上并没有太高的价值”、“在靖边道辖区内并不是重要的军事要地”的结论。窃以为，这里问题取舍的关键已非史实地认定，而在于研究者对自身研究价值判断的把握分寸。

靖边营做为延绥西路最重要的粮储重地，遭受北虏侵扰较少，正是其发挥区域粮饷馈应功能的自然结果。本文不拟再过分强调后勤补给对“一应粮草俱系腹里人民供给”<sup>⑤</sup>的延绥沿边防区的重要性<sup>⑥</sup>。只想指出，难道靖边营也需如镇靖堡一般，在刚设立中路参将的第二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即被蒙人攻陷，导致参将、指挥、千户皆战死，总兵、副总兵、巡抚连坐的结果<sup>⑦</sup>，才能证明其在沿边军事价值之高、作用之大吗？

镇靖堡的确是沿边北虏南下的紧要通道，正如嘉靖后期巡抚胡志夔所说“乃延安门户”<sup>⑧</sup>，而靖边营显然不在这一交通要道上。但问题是，明廷与北虏大致以边墙为界划疆而治，双方处于军事敌对的战争状态，似乎两者之间的攻防交锋不宜套用现代城市地理学的现成理论，从而认为靖边营不占据交通优势，引申出镇靖堡地位可与

<sup>①</sup>郭红、靳润成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8—381页；再，有研究据《明神宗实录》卷426，万历三十四年十月己未条：“延绥靖边卫守备苗守荣为甘肃洪水堡游击”一句认为曾设“靖边卫”（参成一农前揭文）。笔者以为此论稍欠审慎。据《明实录·校勘记》载抱经楼本该处作“靖边营”。此勘极为紧要，盖守备为镇戍兵制官名，属“无品级、无定员”之列，卫所官职体系中并无守备一职，然该营却有守备一缺（按万历年添设，据《明会典·万历朝重修本》卷126《兵部九·镇戍一·将领上·延绥》，（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55页）。另据万历《延绥镇志》，只记有“靖边守御千户所”（卷2《建官》）；清初亦只称有“靖边千户所”，皆无靖边卫（康熙《延绥镇志》卷2《建置志》）。

<sup>②</sup>《明穆宗实录》卷4，隆庆元年二月壬寅条。

<sup>③</sup>按万历《明会典》卷126《兵部九·镇戍一·将领上》“延绥”一节内容有再细化认识之必要。兹节录成一农前揭文所引如下：“协守一员；定边副总兵，定边营，又有游击、守备、都司三员。嘉靖四十一年裁革游击都司，添设总兵，分守安定、镇靖等处，提调大墙及墙口等处。所属参将守备，共四员，分守六员：……西路参将，旧驻旧安边营。成化间，移新安边营。嘉靖二十一年，复驻旧安边营。中路参将，嘉靖四十三年添设，驻镇靖堡，所属靖边营守备……守备十一员……宁塞营，嘉靖四十三年添设；靖边营，万历年添设。”上述标点不无可议之处，要者在于“安定镇靖”如何点断。如前引所断，则“安定”不可解，一者非指安定县（巩昌府属），二者沿边也无安定堡。（实录中作“安定镇靖”，参《明世宗实录》卷509，嘉靖四十一年五月己丑条）后文“所属参将、守备，共四员”或可提供线索，定边营原设游击、守备、都司三员，后裁革游击、都司，只留守备一员，与添设之副总兵同驻。由此加旧安边营所驻之西路参将，镇靖堡所驻之中路参将，靖边营所驻之守备，符前文所属四员之数。故“安定镇靖”宜标点为“安、定、镇、靖”，分指旧安边营、定边营、镇靖堡和靖边营四处。镇靖堡之中路参将领靖边营之守备，而定边营之守备因与副总兵同城，故不属旧安边营参将。

<sup>④</sup>《明世宗实录》卷535，嘉靖四十三年六月癸酉条。

<sup>⑤</sup>《明宪宗实录》卷77，成化六年三月壬辰条。

<sup>⑥</sup>有关延绥地区军事防御与粮饷供给之间关系的研究，可参程龙前著及赖建诚著《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按清初沿边地区的粮食供应依然仰仗内地，可参（清）汪景祺著《读书堂西征随笔》之“榆林兵备”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标点本，第19页。

<sup>⑦</sup>《明世宗实录》卷556，嘉靖四十五年三月戊午条。

<sup>⑧</sup>《明世宗实录》卷535，嘉靖四十三年六月癸酉条。

表 1 雍正二年陕北沿边地方行政建置表

延安三厅	掌印官员	驻地	原领城堡	新委官员	驻地	分领城堡
神木厅	延安府同知	神木	东路十堡			黄甫川等十营堡
榆林厅	延安府同知	榆林	中路十堡	鄜州州同	榆林	双山、常乐、保宁、归德、鱼河
				葭州州同	波罗	响水、波罗、怀远
				巡检	威武	清平、威武
靖边厅	延安府同知	靖边	西路十堡	县丞	定边	定边、砖井、盐场
				延安府经历	靖边	靖边、镇罗、宁塞
				巡检	镇靖	镇靖、龙州
				绥德州州同	安边	安边、柳树涧

资料来源：《清世宗实录》卷 26，雍正二年十一月乙丑条；按清制，府同知正五品；州同从六品；府经历及县丞皆正八品；巡检从九品；驻定边之县丞原为宜川县县丞，此改为“延安府分驻定边县丞”。

之“抗衡”的结论。即便是在明清鼎革之后，由于沿边禁留地的存在，使得边墙内外的交流仍然处于受到限制的阶段。即使从康熙末年放松边内民人出边耕种的禁令，但这个范围也基本局限在五十里以内，其规模有限。因此在设县之前，以边墙内外为主导的交通模式并未成熟，靖边一带本质上是一个以边墙为限，较为封闭的政治环境。从另一个角度看，靖边地区沿边墙东西方向的交通仍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明代，边墙内侧形成的通道，是沿边物流、人流和信息流的主要凭借，所谓“商旅游行，循沟垒不受惊张之虞”，“运粮者循边墙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绝”。密集营堡群及联系其间的交通道路节省了驿站设置，入清以后继续沿用，成为明清两代陕北长城沿线沟通东西向最重要的官驿大道<sup>①</sup>。

前文不厌其烦地对明代靖边诸堡地位和职能进行比较和权衡，但实质上，清代雍正时期靖边设县择治的决策恐怕主要还是出于对当时“现实”情况的考虑。纵使嘉靖后期以来，延绥西路沿边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极大加强了镇靖诸堡的地位，也仍然没有理由认为，入清八十多年后，靖边县治可能会“选择”镇靖堡的原因是来自军事重要与否地考量。显然，这与清初以来沿边地区不断推进的内地化进程格格不入。事实上，驻扎镇靖堡的参将入清即被裁撤，靖边诸堡中除靖边营城驻有级别稍高的游击外，其余各堡只有绿营兵制中的守备一职。前朝军事地位“显赫一时”的镇靖堡因此重回平庸。比较而言，靖

边道和城堡同知虽在康熙时期被裁撤，但承自明代的延安府管粮同知却依然驻扎靖边，并成为该府在沿边地区设立的所谓“三厅”之一<sup>②</sup>。雍正二年（1724年），清廷进一步细化了三厅所属官员（表 1）。

在表 1 所示地方行政地理格局基础上，雍正八年，陕北沿边地区得以郡县化，据《清历朝实录》记载：

一、陕西省延安府属榆林、靖边、神木三厅，管辖沿边三十堡。除神木同知所辖东十堡已改归州县管辖外，其榆林同知所管中十堡，靖边同知所管西十堡，现今夷汉杂居，必须大员弹压；请于榆林地方设知府一员，照磨一员，即将榆林州同、靖边经历、定边县丞各改为知县；怀远堡亦改设知县；四县俱添设典史一员……一、榆林添设府县，足资分理，原设之榆林、靖边同知及波罗州同，威武、镇靖巡检、榆林广育仓大使各缺均请裁汰；惟留神木同知一员以司粮捕。<sup>③</sup>

从上述变动过程可以看出，选择靖边营城作为县治所在，应该是充分尊重历史渊源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当然，这种渊源不必被过分夸大，以靖边临县怀远（今横山）县治的选择即可对此

<sup>①</sup>嘉靖《宁夏新志》、王琼《北虏事迹》，皆转引自张萍《谁主沉浮：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的解读——基于明代延绥长城诸边堡的考察》，第 174—175 页。

<sup>②</sup>[清]汪景祺著：《读书堂西征随笔》之“延安三厅”条，第 25 页。

<sup>③</sup>《清世宗实录》卷 100，雍正八年十一月壬午条。

加以说明。县城怀远堡在明代和清初的军事地位，比较而言都不是重要之地，可设县时却偏偏没有选择附近其他更有“历史渊源”的城堡，可以认为当时治所的选择会根据一些现实的考虑来做出决定<sup>①</sup>。

总之，将镇靖堡在明代军事镇戍地位的“突出”和所谓“交通地理”条件的优越，作为挑战靖边营城做为清代靖边县治首选的依据基本靠不住，也经不起推敲。诚然，在今人看来能够成为影响历史进程发展的因素或许不可胜数，但当我们真正努力试图回到历史情景中去时，才会发现许多“可能”不过是一厢情愿。这并非是说本文容忍“以果推因”的研究方法，而是强调任何历史研究结论推演的前提都需要尊重最基本的事实。

### 三 可能与现实：镇靖堡设治

接下来讨论“同治八年迁治”，其实也和前述类似，是在历史的可能与现实之间寻找重新检讨的路径。但前提同样是，首先要回到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

#### 1. 有县无治：同治战乱中的靖边县

翻检光绪《靖边县志稿·职官志》会发现，在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新任知县梁以恭之前的历任，都缺乏履职年份的记录。据称这是“嘉光以来七十余年，册档全佚”的结果，而造成这一官方记录中断的直接原因是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

同治六年（1867年），回民起义的烈焰日益染指靖边。六月，攻新城堡（即靖边营城），时任知县曹德元，正是梁以恭的前任。据志载，此番攻守双方十分惨烈，以致县把总高文英、典史谢兆球、训导雷建辰“均死之”，全城“妇女饮鸩悬梁死者甚夥”，曹命令百姓及属下“宜急逃”后，最终寡不敌众以身殉职<sup>②</sup>。

此番战乱浩劫造成的结果，使设于新城堡的全部行政机构和职官系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城陷破坏”、“衙署一切均被贼毁”<sup>③</sup>，“由是贼频来，明年土匪据之”。同月，镇靖堡亦被攻陷，其他城堡陆续遭到侵扰，损失惨重。如“龙州杀掠甚惨……民多半死亡”<sup>④</sup>。经此战乱洗礼，靖

边“五堡均被贼毁，民多逃亡”<sup>⑤</sup>，“满县蒿莱成林，豺狼丛生，飞穿屋颠而下攫人食之，继以瘟疫民靡孑遗”。清政府失去了对靖边县大部分地区的有效控制，县级行政机构荡然无存，成了名副其实的有县无治。

被回民起义军攻陷后的新城堡，俨然一座“空城”，从同治七年（1868年）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被“甘肃土匪”盘踞，镇靖堡当地乡绅虽组织堡民“结茅搭棚作寨以守”，亦不免陷于匪巢，据称“贼匪”董福祥部“恃镇靖堡为坚巢，其眷属则窃踞靖边”<sup>⑥</sup>。同治七年（1868年）十二月后，清军刘松山部由绥德进攻镇靖堡，董福祥起义军投降，县境东部局势稍定。同治八年八月，新任“知县梁以恭由榆林委署，带兵抵镇靖，招抚流亡，设赈劝垦，散牛种，民渐苏”<sup>⑦</sup>。可见，在新城堡陷落、知县曹德元被杀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靖边县实际是没有知县管理，更遑论其行政管理机构。而新知县梁以恭到达镇靖堡，重新开始行使牧民之权，也就意味着近代靖边县“第一次”迁治的完成。

#### 2. 插曲：“临时治所”宁条梁

新城堡遭陷前夕，知县曹德元料到大势将去，于是“先遣人以县印送宁条梁巡检李梦兰，李遂权护县印，飭催五堡乡团各自防守”<sup>⑧</sup>。县城失守使边外的宁条梁成为全县的“临时治所”，由从九品巡检李梦兰掌印，延续着政府在名义上对全县的统辖。在危急时刻，曹氏为何会将重要的县印送往宁条梁呢？

<sup>①</sup>按道光《增修怀远县志》卷1《城堡》载：“怀远本卫所营砦也，而改设县焉……因其波、响、威、清四堡适中，故以为县治，取其便民也”。

<sup>②</sup>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灾劫》；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72《名宦九》。

<sup>③</sup>[清]丁锡奎：《捐廉创修书院拟抵衙署禀本道府》，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近来禀稿》。

<sup>④</sup>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灾劫》。

<sup>⑤</sup>[清]丁锡奎：《拟改修城垣未能筹办通禀由》，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近来禀稿》。

<sup>⑥</sup>《清穆宗实录》卷251，同治八年正月庚寅条；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灾劫》。按“甘肃土匪”指董福祥率领的抗清起义军，同治七、八年间靖边县境各堡主要由其控制。

<sup>⑦</sup>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灾劫》。

<sup>⑧</sup>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灾劫》。

宁条梁这一地名在明代已出现在官方文献的记录中，当时只是一处沿边官军抗击北虏的边外战场<sup>①</sup>。该地再次“回到”文献中的时间，大致在康熙前期，据乾隆初年川陕总督庆复回顾前事时云：“宁条梁、四十里铺、石渡口等处……原为军兴时商民凑集而设。今军需停止，行旅稀少，无需建堡。惟宁条梁有居民三百余家。应请于宁塞堡拨出把总一员，带马守兵四十名移驻。”<sup>②</sup>此议得到允准，其缘起则是乾隆三年（1738年）时前任川陕总督查郎阿所建言修筑土堡之事，其中有云：“延绥镇属定边协管辖地方，从前客商俱从宁塞堡行走，嗣因道路崎岖，改由宁条梁进口”<sup>③</sup>。庆复所言为我们揣测宁条梁在清初兴起的时间和原因有了更为清晰地认识。康熙前期以征讨噶尔丹为目的不断在西北用兵，鄂尔多斯地区是清军重要的军需物资补给区，包括马、驼、牛、羊等在内都是常见供应品，当然这还不是军需物资的全部。因此，有需求就必然有贸易的场所，宁条梁正是由“军兴”引发的“商民凑集”而起。战事平息后，在地方形势日渐稳定的背景下，宁条梁没有像其他几处贸易地点一样昙花一现衰落下去，而是因为聚集人口较多继以得到官方的重视，以致需要驻扎绿营兵来维持地方治安。这里的原因，一者可能是附近的边外土地开垦已达到些许规模，二者则与其所担当的贸易聚集地功能密切相关。宁条梁替代宁塞堡贸易地位的时间，可能就发生在康熙前期所谓“军兴”的过程当中。乾隆二十年（1755年），陕西巡抚台柱奏称：“延安府属靖边县口外宁条梁地方，蒙古、汉人交集，距县远，仅把总一员驻防，请将凤县留坝司巡检裁汰，添设宁条梁巡检”<sup>④</sup>。宁条梁日渐受到重视，与靖边县各城堡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密切。按当时规定，在蒙汉之间的牲畜交易中，汉民需向内地州县政府交税，原先在宁塞堡交易时，因属内地，故沿边地方机构控制尚可。移至边外宁条梁后，“因地方官吏未去收税，买卖牲畜之民人为逃税，由此出边墙外互相贸易，偷税漏税者甚多”<sup>⑤</sup>。随着蒙汉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税收流失严重，故此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陕西巡抚上奏要求在宁条梁设收税官员。第二年（1767年），又再次以“宁条梁地域广阔不易检查”为由，请求

在边内的镇靖堡设税卡，征收除牲畜税外的其他物品交易税，并派员向在宁条梁交易牲畜的汉民专门征税。之所以将镇靖堡和宁条梁联系在一起收税，实因两地“相距颇近”。上述请求除了在镇靖堡设税卡得到清廷允准外，其他都未获批。因为在朝廷看来，有了镇靖税卡，再在宁条梁收税属于将“内地税移蒙地收”，“从无地方官吏至蒙地收畜税之例”。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对榆林道和靖边县而言，他们只能在最靠近宁条梁的镇靖堡设立税局，向来此交易的蒙汉民众征收各种交易税。无疑可以想见，在没有税收负担下的宁条梁，一定还会吸引更多的边外蒙民和内地民众前来进行物资交易。光绪《靖边县志稿》所说“宁条梁，夙称繁富，客商辐凑，民人数（十）万”可能并非过分夸张。

曹氏命将县印送往宁条梁，一者是看重其重要地位，二者也是因为各堡皆陷，惟巡检尚在其处。同治六年六月至七年十月，回民和甘肃两支起义军多次“骚扰”宁条梁，但“李巡检以大义羁縻之，民众犹恃为安危，强相撑持”。不久，“贼猝至，执巡检李梦兰，杀之。屠民人罄净，间有逃出者，四路伏窜，街镇一空”<sup>⑥</sup>。又光绪《靖边县志稿·职官志》称：“李梦兰，甘肃庄浪人，同治年任。廉明勇敢，屡带民团杀回贼，贼畏之。远近客民倚为安危者，亿万人。惜沙地无城堡，七年春冬迭被贼陷，梦兰力竭死之。而梁镇街市，一片菁华同归灰烬矣。”

李殉职后，做了一年多“临时治所”的宁条梁到此为止，连当初曹德元派人送来的县印也迷失在战乱中，直到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朝

①《明世宗实录》卷279，嘉靖二十二年十月己卯条。

②《清高宗实录》卷206，乾隆八年十二月丙辰条。

③《清高宗实录》卷502，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乙巳条。

④《清高宗实录》卷502，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乙巳条。

⑤《理藩院为宁条梁收税事宜札扎萨克贝子纳木扎勒多尔济文·乾隆四十二年三月初七日》，金海等编译：《准格尔旗扎萨克衙门档案译编》（第1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4—56页；按下文所引皆同出，恕不另注。

⑥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灾劫》。

廷才补铸该县“印信条记”<sup>①</sup>。

虽在战乱中颇受打击，但动乱平息后，宁条梁作为边外贸易集散中心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所谓“梁镇乱后，无畴昔千百之一，然风脉究胜他处”<sup>②</sup>。那么宁条梁是不是可以作为乱后治所选址的最佳地点呢？

事实上，宁条梁根本不具有成为县治的可能。要言之，它乃是在边外形成的一处商业贸易集镇，而边外土地权属归蒙民所有，汉民只是租借而已，每年都需向蒙民纳租。宁条梁周边土地同样如此，至于其“街市”铺面、家院，也要每年向蒙古贵族交纳“门面银”<sup>③</sup>。史料中提及包括宁条梁在内边外伙盘地属于蒙地的记录随处可见<sup>④</sup>。有趣的是，在上文引述乾隆年间陕西巡抚请求在宁条梁和镇靖堡两地同时收税的理由时，他们都辩称“宁条梁、镇靖堡均属靖边县辖地，将每年所收牲畜税由靖边县造册报部”。然而，朝廷明察秋毫，很快指出“宁条梁为鄂尔多斯贝勒栋罗布色稜地，绝非内地”、“宁条梁属蒙地，并非属内地”。以致地方政府欲在两地征税之议搁浅，而之所以要将蒙地认为内地，窃以为极有可能与当地政府急于扩大税收财政来源有关，但这并不能作为宁条梁成为内地的理由。试想对于当时人，特别是具有决策权的地方政府和官员而言，怎会有将县治迁往边外蒙地的奇怪想法呢？退而言之，宁条梁“沙地无城堡”，在同治回民起义刚刚结束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客观实情也使地方政府不可能考虑将治所设在宁条梁。再者，该镇位置甚为偏处一隅，“距县远”，以此为治无疑也不利于今后的行政管理。总之，同治年间新城堡遭受灭顶打击后，宁条梁根本不具备成为新治可能的前提，此间短暂为治的经历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权宜之计，并非常态社会的真实面相。

### 3. 真正的可能：重回旧治

同治八年（1869年）八月，梁以恭赴镇靖堡上任，标志靖边县第一次迁治完成。当时有关治所选址的真正可能其实有两处，即镇靖堡和旧治新城堡。历史最终选择了前者，这是地方政府在两者之间不断比较的结果。

究其原因，一是乱后两堡人口差异显著；二是衙署等设施的保存状况。回民起义后，靖边县“五堡均被贼毁，民多逃亡，惟镇靖居民尚有三

四十家”<sup>⑤</sup>，新城堡则“薪水艰难，苦无居人”<sup>⑥</sup>。对地方行政机构而言，设在一个“空城”里是无法想象的。而镇靖堡相对全县“四乡居民沿崖傍涧，往往二三十里仅见一二人家”<sup>⑦</sup>的情况，无疑境况稍好。衙署等基础设施的破坏程度是另一方面。“自遭兵燹，新城衙署一切均被贼毁，县治遂移镇靖堡，藉旧防营草作衙署”，虽然新治也只能借用旧防营勉强度日，但总比新城堡一无所有乐观。

尽管如此，将县治迁回新城堡的呼声事实上并未消失。同治十一年（1872年），孔广晋任知县，甫到即试图将治所迁回新城堡。同治十二年，镇靖都司李志刚监督兴修新城堡，孔广晋派乡勇帮助修理，使其“现尚完整”。此次修城实属不易，即便镇靖堡也是“全坏未修”，以致后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知县丁锡奎“以公款奇绌，民力凋敝，拟请改筑今治城，截去一半，庶费少易成”<sup>⑧</sup>。倘若孔广晋没有迁回旧治的打算，恐怕断然不会在乱后社会凋敝的状况面前徒增破费。不仅如此，光绪元年（1875年），他“禀请库银，仍在旧治重修新城书院”，对此丁锡奎后来议论道：“盖彼时尚欲复旧治也，岂知时势碍难，迄今旧治仍无人烟，书院久经旷废，官师仍在新治”<sup>⑨</sup>。显然，到光绪后期，人们已经完全接受县治设于镇靖的现实了，以致迁回旧治的想法反倒成为一种匪夷所思。

①《清穆宗实录》卷293，同治九年十月戊午条。

②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舆地志·图绘·边外总图》。

③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杂志·蒙界租户》。

④如“县界边墙，民人租种蒙地五万余垧，纳租该盟长，轮派甲收，每年由蒙员催收，有事仍禀县核追。”（光绪《靖边县志稿·凡例》）“梁镇本系蒙地”（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田赋志·厘税局公所》）、“蒙地宁条梁”（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35《征徭二》）、“宁镇……蒙地，向无堡寨，环街周围挑壕作卡，以民守之”（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72《名宦九》）等等，不一而足。

⑤[清]丁锡奎：《拟改修城垣未能筹办通禀由》。

⑥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建置志·城池》。

⑦[清]丁锡奎：《拟改修城垣未能筹办通禀由》。

⑧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建置志·城池》。

⑨[清]丁锡奎：《捐廉创修书院拟抵衙署禀本道府》。



笔者以为，尽管迁治镇靖堡带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例如战争），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大势所趋的表达。只是此前拙文将边外伙盘地的开发与治所的北移之间直接加以勾连，在逻辑上稍显单薄。或许可以从新城堡失去治所地位后，无论后来如何努力仍难恢复其昔日地位这一角度，重新为此前两者之间关系的确立找到根据。假如新城堡仅是因为回民起义的影响，失去了设治的条件，那么此后孔广晋一系列“技术层面”上的弥补与重振，就应当收获预期的效果。然而，这些举措杯水车薪，对新城堡的“复兴”居然没有起到丝毫作用，以致后来丁锡奎不无暗讽地指出“岂知时势碍难”？此间反映的区域历史变迁趋势值得深思。

总之，看似应该可能成为县治备选的边外重镇宁条梁，实质上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但是，战乱中短暂成为临时治所的经历，却提醒我们注意，该镇往往在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对此下文还有论述。真正能够影响同治八年迁治的可能选项，仍是旧治新城堡，只是这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得愈加不靠谱，以致光绪后期当政者已完全接受镇靖堡作为新县治的历史事实。

#### 四 “1942年迁治张家畔”研究之检讨

笔者在翻检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以往对“1942年迁治张家畔”的说法，往往忽略了一些关键性问题，值得重新检讨。

1. 似是而非：1942年“县城移置张家畔”？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为了交通方便，县城移置张家畔”一说，出自新修《靖边县志》“县城变迁”一节<sup>①</sup>。对此，包括此前拙文在内以往研究皆未深究。但此处“破绽”不少，比如是几月移置的县城，又是为与何地的“交通方便”等等。

另据资料称：靖边“县政府驻地于1942年冬从镇靖迁到张家畔”<sup>②</sup>。虽将时间明确到冬天，但仍嫌模糊。笔者有幸找到一位曾在张家畔工作过的陕甘宁边区青年的回忆录，描述他从1942年春至翌年夏在该处工作、生活的情况，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兹摘要如下：

张家畔是陕西省靖边县的一个小镇子，地处沙漠地带。当时人们形容张家畔“一年一场风，初春到残冬。”这当然有点言过其实了，但说明张家畔人烟稀少，比较荒凉。张家畔在延安西北方向，距延安有三至四天的路程。它与国民党驻防区安边县宁条梁镇接壤……我是一九四二年春去张家畔光华商店工作的，任营业科长兼门市部主任……盐业支公司……主要经营食盐，兼营粮食、茶叶、土布等。购盐对象主要是蒙古族人民，每天约有百多条骆驼驮盐进店，可购进食盐三至四万斤。蒙民把盐出售后买走土布和小米、茶叶等。张家畔属食盐集散之地……食盐流向，一是绥德地区，一是陕西关中地区。张家畔唯一的政府机关是税务局……盐业公司和税务局是一个党支部……张家畔有一家小杂货店是敌人坐探的据点，专门刺探我方政治、军事、经济情况，并策动我方人员叛逃。张家畔比延安更加艰苦，燃料极端困难，做饭烧柴草，取暖用木炭，有时烧点煤是盐商从瓦窑堡运来的……有三十亩的场地可供骆驼歇宿和装卸盐包之用。

……我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一九四三年的夏季，又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了。<sup>③</sup>

由于是忆者数十年后的描述，所以偏差可能在所难免。问题是，从中完全看不出有中共靖边县委（县政府）搬迁到张家畔的任何迹象，忆者甚至强调唯一的政府机关是“税务局”。以当时张家畔的聚落规模，一个县委机关的到来，不应没有在记忆中留下痕迹。可见，所谓“1942年迁治张家畔”的说法值得审慎对待。

<sup>①</sup>靖边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靖边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8页；另参惠永明编著《榆林纪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5页。

<sup>②</sup>中共靖边县委组织部、中共靖边县委党史研究室、靖边县档案馆：《中国共产党陕西省靖边县组织史资料（1934.8—1987.10）》（内部发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46页。

<sup>③</sup>卓毅然：《在延安光华商店和两个盐业支公司的几年》，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73—75页。

陕甘宁边区的政府文件也可侧面证明这种怀疑。1942年12月，边区政府在命令中称：

张家畔靠近蒙界，几年来因为盐业的发展，市面逐渐繁荣起来。附近居民，每于农暇时，以自由贩运食盐作为正常之副业者很多……张家畔非比于其他市镇，除盐业而外，别少利润可图，现在正届冬临农暇期，无论商民、农民均纷纷呼叫，相反友方宁条梁及蒙地商人乃借机在该管辖区域内大事筹设盐店。依据上项理由政府应以张家畔为特殊情形，准予私人盐店继续营业。<sup>①</sup>

不但在目前笔者所见边区政府文件中未发现靖边县委（政府）1942年迁到张家畔的直接记录，而且另有资料显示县治是在“一九四五年迁张家畔”<sup>②</sup>。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迁治时间模糊不定而又间有异说的情况呢？或许要从当时靖边县所处的特殊历史地理环境中寻找答案。1935年6月，刘志丹攻克国民政府靖边县城镇靖堡，该县府只得迁往县境西北隅的宁条梁镇。就全县而言，大部分地区归中共所控制，国民党政权事实上“仅控制宁条梁围圆三十里之境”<sup>③</sup>。抗战时期，边区政府曾多次要求将辖区内的国民党县级政权撤销，改变“一县两长”的局面，但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被国民政府接受<sup>④</sup>。换言之，国民党政权靖边县政府设在宁条梁本非情愿，而是极端历史政治条件下的产物。这一时期在国民政府档案中称宁条梁为“临时县治”，称镇靖堡则为“靖边旧治”<sup>⑤</sup>。显然，在镇靖堡失守前，国民党政权是不会无缘无故主动选择迁治宁条梁镇的。

从1935年5月到1949年10月，中共靖边县委多次改换驻地，甚至同一时期出现“三县（委）并立”的局面（参表2）。若以中共靖边县委驻地为县城所在，那么在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靖边县治可谓遍布全县，张家畔也不过是众多“县城”中的一个。事实上，其真正成为中共靖边县政府驻地稳定下来，是全国解放以后。1942年冬，靖边县委迁到张家畔是其第一次作为地方政府的驻地，在边区档案及后人回忆中没有留下痕迹，或许与机关驻地频繁迁移、驻扎时间很短有关。至于文献中的不同说法，则可能是选取张家畔作为县治起始时间的标准不同所造成

的。1993年编写《靖边县志》时，之所以强调“1942年迁治”张家畔，显然是受到后来历史选择的影响。

## 2. 张家畔：食盐集散与汉蒙贸易之地

前引卓毅然的回忆，有助于解释《靖边县志》所说的“交通方便”一语。抗战时期，为克服经济困难、打破国民党当局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发起大规模的食盐运销活动，对边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此学界已有研究<sup>⑥</sup>。

运盐需由交通道路来连接产地和销地，边区政府组织了三条运盐主干线：定边至延安、定边至庆阳和靖边至清涧。当时对道路实施加宽，减小坡度，增修或加固桥梁、涵洞，以保通行顺利和安全；并在沿途重要集散地建立食盐转运站和骡马站等<sup>⑦</sup>。来靖边运盐的销地主要有清涧和绥德，一由清涧至瓦窑堡转盐池，一由绥德经石湾、

①《陕甘宁边区政府命令 [战字第 628 号] —— 妥拟准许张家畔私人盐店继续营业办法（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6 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年，第 415—416 页；另参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年，第 172 页。

②河洛：《陕西地名、县名简介》，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编《西北历史资料》，1980 年第 3 期。

③榆林市档案馆藏：《敌伪政治档案案卷·陕西省榆林专员公署参谋室·兵要地志卷》（1948 年 10 月至 1949 年 1 月），全宗号 64，目录号 9，案卷号 45。

④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01—205 页。

⑤榆林市档案馆藏：《旧政权档案·陕西省榆林专员公署参谋室·兵要地志》（1944 年 12 月至 1945 年 9 月），全宗号 64，目录号 9，案卷号 95。

⑥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盐业》，《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 4 期。

⑦闫树声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3 年，第 139 页。

表2 中共靖边县委沿革与驻地变动概况表 (1935. 5至今)

驻地 时间 县委	1935. 9—1937. 9	1937. 9—1945. 8	1945. 8—1949. 10	1949. 10 至今
靖边县委 (东靖边)	店家城、青阳岔、卧牛城、吴家峁子、杜家峁、郑石湾、焦家湾、陈家砭、大台、李邱家坪			
靖边县委 (西靖边)	桃李瓜 (今属志丹)、蒋家寺、小张家畔、沙洼沟 (1935. 5—1935. 11)			
新城县委	杜元峁、小李圪坨、李寺湾、高粱湾、总关口 (1936. 9—1937. 7)			
靖横县委 (靖边、横山、新城三县委合并)		李邱家坪 (1937. 9—1937. 11)		
靖边县委		镇靖堡 (1937. 11—1942. 冬) 张家畔 (1942. 冬—1945. 8)	杨渠、张家岔、薛家畔、镇靖堡、小河、龙州, 余在张家畔	张家畔镇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陕西省靖边县组织史资料 (1934. 8—1987. 10)》(内部发行), 第1—64页。

青阳岔、张家畔至盐池<sup>①</sup>。加上已有的靖边至延安的大车道<sup>②</sup>, 进出靖边的交通道路因此发展起来, 张家畔由于地处食盐集散地, 故成为上述几条盐道的交汇点。

所谓“交通方便”, 指张家畔的地理位置比镇靖堡优越。此间微妙差异, 可从清末官方有关两地的比较来说明。光绪末年, 知县丁锡奎在试图振兴镇靖堡时, 发现“近数年来奸商结串, 绕走张家畔一带……令归原路, 均置罔闻”。“原路”指经过镇靖的通商道路, “其客货由西来者, 梁镇上税, 镇靖查票; 由东来者, 大台上税, 亦镇靖查票”。丁氏认为避漏商税是影响振兴镇靖堡经济的主要原因。他说“奸商”漏税是因“张家畔有河一渡, 桥由民搭。本城东北门外有河两渡, 其桥向由民搭。嗣经卑前任彭令会楫捐钱生息, 委令典史经理搭桥。积久未免弊生, 或稍有照管不到之处, 伊等借此不前”<sup>③</sup>。为此, 他力主革除旧弊, 使商民重以镇靖为通衢<sup>④</sup>。当时, 县民张占福、张兴德以“路平而近”为由稟请将通往宁条梁的大路改走张家畔, 遭到丁的强烈驳斥: “平则有之, 明明较镇靖迂远十里, 何得又诬为近”<sup>⑤</sup>。事实上, 由于自身局限所致, 丁氏的观点充满维护镇靖堡的本位意识。不可否认, 商民不走张家畔确有避漏商税之嫌, 然从便捷的

角度, 张家畔的确比镇靖堡优越。镇靖堡建于芦河支流交汇处, 出入该城均需过河, 即所谓“两渡”, 且地处边内横山北缘, 若选走该城, 无形中增添若干“翻山越岭”之烦。张家畔则不然, 其地虽仅在镇靖堡以北10公里处, 但已位于边外风沙滩地区, “镇靖城……治北蒙地, 多平沙, 俗呼曰滩, 由张家畔东驰石渡口塘, 出怀远境, 西驰沙头、红柳、宁条梁塘, 出定边境, 路通榆陇”<sup>⑥</sup>。选走张家畔一路无阻, 自然利于交通。即便丁氏言“远十里”为实情, 但张氏的“路平

<sup>①</sup>《边区政府对绥德分区专署运盐及灾情报告的复信 [后字第986号]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七日)·附绥德分区专署的两个报告》,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8年, 第41页。

<sup>②</sup>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 第84页。

<sup>③</sup>[清]丁锡奎:《拟复镇靖通衢稟本道府》, 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近来稟稿》。

<sup>④</sup>[清]丁锡奎:《拟办桥工新章稟本道府》, 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近来稟稿》。

<sup>⑤</sup>[清]丁锡奎:《批示张占福、张兴德稟移大路由》, 光绪《靖边县志稿》卷4《艺文志·近来稟稿》。

<sup>⑥</sup>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舆地志·图绘·县总图说》。

而近”若指时间，则也非虚言。张家畔周边环境也颇有特点，“新治北海子滩及张家畔一带，海孔无数，绿柳遍似隋堤。每春日波光映树，有鹤偕来，结巢水中，飞行半空，如在绿云。土人探取其卵，呼为‘沙鸢’。”<sup>①</sup>其实，就连丁锡奎本人也都已意识到张家畔通衢地位的日益显现，承认：“详度地形，张家畔一带地亩宽饶，林木密茂，民间可耕可樵，仅纳租王府，别无赋徭，日用优裕，今藉此通衢適足长本地之游惰，招外来之匪徒”<sup>②</sup>。

成为食盐运输集散地和汉蒙贸易的场所，是张家畔“交通方便”所表现出的两个方面。正如卓毅然所说，张家畔的食盐源自蒙民从边外驮运而来，并以此交换边区的粮食、布匹和茶叶。“境外蒙民与边区的交往很频繁，每年定边、靖边、盐池等地的骡马大会都有伊克昭盟等地的蒙民和宁夏的回民赶着骡、马、牛、羊来进行交易”<sup>③</sup>，当时边区政府文件也证明蒙民在粮食等物资方面时常仰仗边区的供给<sup>④</sup>。张家畔恰好处于这种蒙汉之间互通有无的临界线上，自然占着勾连周边交通的制高点。

本来边外的土地所有权属蒙古贵族和民众，汉民只是租种暂居，如丁锡奎说张家畔“纳租王府”即是明证。民国初年，蒙汉双方曾对边外一定范围内的土地归属发生过激烈地争夺，蒙方强调以明长城为界，汉人则坚决反对，要求维持现状，双方相持不下，最终不了了之<sup>⑤</sup>。但是如此造成的结果是，汉人以即成事实的方式最终占了相当部分的边外蒙地，张家畔和宁条梁等皆在此范围内。边区政府成立以后，在继续保证汉人拥有边外土地权属的基础上，对另一部分蒙民聚居的地区，以归还“汉族军阀豪绅侵占之蒙地”的名义重新划拨给鄂尔多斯各旗<sup>⑥</sup>。所以到抗战时期，中共靖边县委移驻到张家畔时，已不存在和蒙方牵涉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所谓1942年迁治张家畔，其实是在晚近“文献书写”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标准说法，并不具备史学研究意义上的客观真实性。20世纪30至40年代靖边县政府驻地的不断改变，既夹杂着国共两党在这一地区有关地方政权“正统性”的相互角力，也反映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自身地方政权机构组织方式和空间布局的不断

变迁。因此，近代靖边县的“第二次”迁治实质经历了一个相对较长的选择过程，其中仍然伴随着些许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比如战争和军事对峙、摩擦等等。但必须指出，笔者仍然坚持在此前拙文中所认为的，靖边迁治镇靖堡乃至张家畔是数百年来区域社会经济变迁影响下的产物。这一系列的治所选址变动，标志着地方社会发展所表现出来的部分轨迹，最终挣脱明代以军事防御为立足点的城堡选址依据，在边疆内地化的背景中，走上了顺应历史发展的道路。换言之，尽管明代中期建设的城堡位置至今未再变化，但作为具有主观选择性的地方政区治所而言，则可以不断根据人文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和适应。一个时代建立的城堡固然可以被后世所继续利用，但这种延续最终必会被新的时代要求所淘汰，从而成为历史的遗迹。

## 五 结 语

以往对靖边县治选择依据的客观考察，往往上溯至对明代靖边诸堡地位地分析比较，固然可以从历史渊源的层面提供依据，但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换言之，靖边县治驻地是由雍正年间“现实”需要所决定的，今天我们不得其详，主要因为文献不足，无从揣度。因此，进一步挖掘可以直接说明问题的史料，是下一步可以深化主题的可能出路。同样，尽管清初宁条梁即已逐渐兴起，但同治年间的治所选择仍然是根据人口和衙署等现实因素在新城堡和镇靖堡之间进行取舍。笔者以为，如果没有战争等偶然因素的干扰，新城堡作为靖边治所驻地的时间还会更久。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两党在靖边县境

①光绪《靖边县志稿》卷1《輿地志·八景》。

②[清]丁锡奎：《拟复镇靖通衢禀本道府》。

③贾瑞梅、郭林主编：《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页。

④如《陕甘宁边区政府便函——请帮助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购运粮食（1940年1月21日）》，载贾瑞梅、郭林主编《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第95页。

⑤樊士杰等编辑：《陕绥划界纪要》，榆林市星元图书馆藏静修斋印刷本，中华民国二十一年（1932）。

⑥贾瑞梅、郭林主编：《陕甘宁边区民族宗教史料选编》，第136页。

的政治角力，造就了一县二治的客观事实。对国民政府而言，宁条梁不过是万不得已的临时驻地，镇靖堡才是真正的县城所在。张家畔能够从中共在靖边众多的政府驻地中“脱颖而出”，成为建国后的新县城，似乎有些偶然。但如果联系此前的迁治过程，或许仍可顿悟区域社会变迁对政区治所驻地改变的无形制约。事实上，影响靖边治所迁徙个案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深化了我们对清初以来陕北沿边地区不断内地化进程地认识。这种蔓延整个区域的历史发展趋势并不因为靖边县治是驻于新城堡，还是镇靖堡抑或张家畔而改变。但既往的事实说明，这种变化确实顺应了更长时段历史演进的动向，成为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选择。

将明代陕北沿边城堡的选址与清代地方政区治所驻地的迁移过程联系在一起，不免给人以穿越之感。毕竟，遗留到今天的大部分明代城堡的最终位置，在成化年间即以确定。所以，后来政区治所不断在这些城堡之间变换，不能被认为城堡本身又经历了重新选址的过程。要言之，陕北

沿边地区的城堡选址与治所迁移本质是两类不同的历史过程。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无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否则便会割裂历史发展的脉络。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说明这种联系。第一，明代沿边城堡延续的兴衰历史与后来其是否作为政区治所关系密切。目前陕北榆林、靖边、横山、定边等市县的情况都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去说明这种联系。第二，固定的城堡位置与不断变换的治所驻地之间，体现了沿边地区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区域社会经济人文要素的重新整合和布局趋向。

靖边迁治的个案，就明清以来陕北沿边地区而言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尽管如此，上述初步结论能否适用于整个区域，其实仍然还需要更多工作的支持，不断总结，方有可能得出更为可靠和系统的认识。因此，本文只是一种尝试，希望接下来地研究和批评能够继续将相关话题深入开展下去。

[后记] 承蒙匿名审稿委员和侯甬坚教授批评，张萍教授的建议对拙文修改至关重要，诚致谢忱！

## Research on Changes of Jingbian County's Capital in Modern China: Through relation between the selection of city site and changes of capital in Northern Shaanxi Province

Li Dahai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west China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Abstract:** The Jingbian County(靖边县) of Shaanxi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in 1730, including five castles by built for military purpose in Ming Dynasty. The article restores the process of changes of the Jingbian county's capital, through analyzing relation between the selection of city site and changes of capital. Because of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y, the Jingbian county had two capitals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changes of capital,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Qing Dynasty, have no relation with the selection of city site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Jingbian County; changes of capital; site selection